

# 自由与秩序：现代大学制度的价值博弈

何毅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自由与秩序是贯穿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价值主线。现代大学制度对自由的价值追求,要求大学必须崇尚学术、发展学术,保持大学的自由氛围和独立精神,但是现代大学日益进入社会中心的现实则要求现代大学要适应社会需要,并被看做是实现社会目的的工具。自由与秩序的价值冲突在大学之外表现为外部干预与大学自治的力量抗争,在大学之内表现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利益博弈。现代大学制度价值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在自由与秩序之间寻求平衡并最终实现“有秩序的自由”。

**关键词:**自由;秩序;现代大学制度;价值博弈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3)10-0010-05

## 一、自由与秩序是贯穿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价值主线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自由与秩序的关系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作为人类的两种基本需求,自由与秩序互相依存又互相对立。<sup>[1]</sup>社会生活中的自由是人的个体性的表现形式,它具有突破社会秩序规范的内在需求,秩序则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形式,它趋向于对自由属性进行约束,是社会规范性的外在体现。只有自由而没有秩序,人类社会将失去基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导向,从而危及社会稳定。只有秩序而没有自由,人的主体性将得不到有效实现,社会将进入专制和紧张状态。因此,自由与秩序的和谐统一是社会规范形成的基本动力,也是社会政治稳定性的价值规定性。

从教育学的视野看,自由与秩序的博弈是两种教育哲学论的交锋。在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看来,大学是探讨高深学问、追求学理的机构,学术是大学的生命,学问本身即是目的。诚如赫钦斯将大学定义为“独立思想中心”<sup>[2]</sup>。在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

看来,大学是社会公共机构的组成部分,追求高深学问只是高等教育为国家服务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大学承担着比追求高深学问更重要的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责任。布鲁贝克关于高等教育哲学二元论的阐述为我们理解高等教育的价值追求开启了一扇窗户。

回到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命题,从理想状态来看,自由是在一定秩序中的自由,而秩序存在的重要目的是保障自由。但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实际是,自由有突破秩序限制的需求,秩序则有限制自由的倾向。自由与秩序问题是贯穿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价值主线。

## 二、现代大学制度的自由价值及其局限

任何一种组织制度都是围绕其本质特点展开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要尊重并体现大学的本质和特性,这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也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生命力所在。

现代大学的首要特质是大学自治。大学自治是作为一个法人团体的大学享有不受国家、教会及任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课题“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视阈下的高校住宿学院制研究”(2013N080)。

作者简介:何毅(1979-),男,湖北十堰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温州大学高教所讲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高校战略规划研究。

何其他官方或非官方法人团体和个人干预的自由。大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外部关系主体,大学自治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早期的西方大学自治主要是使大学摆脱教会的控制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行会共同体,大学自治突出表现为处理与神权、教会的关系。随着大学重要性的逐步体现,政府对大学的控制不断加强,大学要在争取政府支持和摆脱政府控制之间寻求平衡,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是大学发展进程中最重要外部关系。今天,大学日益走进社会中心,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和知识库,大学与市场、商业界和产业界的联系日益紧密,现代大学自治具有更加多样的外部关系处理形式。

现代大学的另一特质是学术自由。在西方大学早期发展史上,大学受到宗教势力和社会权贵的控制,各种非学术力量对学术力量的侵蚀使教师缺乏基本的学术生活保障。因此,早期西方大学的学术自由制度主要是一种教师保障制度,外在表现为学术与非学术的矛盾,内在则体现为科学与神学的冲突。今天学术自由已经突破了教师保障制度的最初动因而上升为学者和大学在追求学术的过程中对各种限制的突破和超越。其一是外部的社会限制。即学者开展学术活动不受外部任何力量的限制和干扰,学术活动遵从的是自己的理性判断,学术活动服务于对真理的执著信念,由此而实现“外在的自由”。其二是主体自身的限制。即学者进行学术活动自身能够超脱各种现实的功利,内源于学术意志的激励。也即是学术活动的形式自由升华为学术意念的自由,学者能够在学术研究中感受学术之美和学术之魅。

现代大学要追求的第三个本源属性是教授治校。“教授就是大学”被许多欧美名校视为圭臬。作为一种学术内行对大学实行民主管理的制度,中世纪大学学者行会式管理的组织特性使教授治校具有深厚传统。但是随着大学“学术—行政共同体”的形成,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矛盾冲突成为教授治校面临的现实障碍。教授治校的制度实质是体现于学术精英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大学只有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保护教授和学校的利益,实现学校、教授、社会三方利益的统一。

自由价值是现代大学制度运行的重要规则,是现代大学制度所要追求的重要价值,也是西方大学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冲突和磨难后最终保存下来的宝贵遗产。现代大学制度的自由价值在本质上是要保证大学特质在大学的存在。今天建立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就是要使“我国大学获得自由的精神,形成自由的传统,让自由引导大学发展的方向”<sup>[3]</sup>。但是自由是具体和现实的,自由的价值也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任何自由的实现都要受到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和社会规范的制约。现代大学制度的自由属性表现为相对的自由。

我国探索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历程即是例证。1898年清朝政府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最早企图模仿日本东京大学的办学模式,但是还未来得及实施就因社会形势的变化而中途夭折。“五四”运动后,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一批留学欧美的大学校长为暮气沉沉的封建性高等教育学堂带来西方大学的学术自治和学术精神,推动了西方大学制度在我国大学的生发。蔡元培提出“没有办学自主权、没有学术自由就不任校长”,胡适则提出要建立“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sup>[4]</sup>。这些现代大学制度探索的先行者们对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执着推动了20世纪30、40年代我国大学的繁荣。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大一统管理和全盘向前苏联学习的“一边倒”政策,使高等教育在管理体制上高度集权,高校缺乏基本的办学自主权,高校更多地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而非独立的办学实体,现代大学制度的早期探索无法得以正常延续。

因此,从时间上看,我国引进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时间并不长,更缺乏深厚的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自由传统。从本质上看,我国现代大学是在西学东渐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借鉴西方大学组织形式的产物,现代大学的产生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相伴,互为因果。<sup>[5]</sup>从现实性看,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大学制度工具价值的导向下,我国大学暴露出政治化办学、官僚化管理、功利化追求和工具化导向等诸多弊端,离理想的现代大学要求甚远。因此,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是“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现代大学制度对自由的价值追求并非一路坦途。

### 三、现代大学制度的秩序价值及其局限

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自由表现为大学内在

的“吸引力”,围绕着对自由的争取,大学内部的权力关系变得纷繁复杂。秩序表现为大学的“外拉力”,在大学外部,围绕着大学自治,大学与政府、社会进行着力量的博弈。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必然对组织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在大学内部,这种强调制度和秩序的行政主导型科层制组织体系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特别是当现代大学变得越来越庞大、与社会接触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正是行政管理带来的秩序性因素的存在避免了大学发生自由化的无序状态。但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自由”传统的缺乏<sup>[6]</sup>,行政主导型的管理在大学普遍存在并且在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管理主义倾向。在这种管理主义倾向下,行为主体上强调行政管理者是大学制度的价值主体,管理者尽量把自己的意志和价值取向体现在大学制度之中来保证其目标的实现。行为方式上强调制度的统一性、行政性和效率优先。制度制定方式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方式。在推行过程中主要以命令和服从作为原则。管理主义倾向下的大学制度过于强调制度的“秩序”特性,至于制度本身是否体现公平,是否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以及是否体现大学制度保障自由的重要功能则常常不在制度制定者考虑之列。

在大学外部,现代大学日益从“有秩序的松散组织”向企业化组织靠拢需要外部秩序规范。社会组织是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系统。按照组织理论的观点,从社会系统来讲,稳定的大学自治系统在防止外在力量对大学渗透的同时也阻碍了大学与社会的互动交流。因为每个组织相互间获得的都是有限的,在一个组织间相互依赖不强的社会里,组织之间的封闭性可能不会导致组织的落后。但是,在组织之间依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不同类别的组织因为开放程度的不同往往带来资源获得的巨大差异。<sup>[7]</sup>以英国为例,英国大学的历史尽管可以追溯到12世纪,但是英国大学在19世纪以来直到近代却没有太大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代表的古典大学具有很强的传统惯性和内部封闭性,不容易接受外部社会的规范约束,其相对保守的大学制度既保护了它的内部自由的秩序,也同样因为缺乏对外部资源的“有序”整合而走向没落。但是,值得警惕的是,大学作为“有秩

序的松散组织”,既要适度遵循“企业化组织”的秩序原则又要维持一个相对独立的运行系统,否则大学将在强调对外部秩序和规范的整合中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方向。

#### 四、自由与秩序在现代大学制度中的实践反映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面临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平衡好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二是如何解决好自身的持续、有效、健康发展。两个问题中一个是外部关系问题,一个是内部关系问题。基于内外部关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从外在制度讲要建立植根于法律的大学法人化制度,从内在制度讲要培育植根于大学本质的学术自由制度。

##### (一)外在制度的自由与秩序:外部干预与大学自治的抗争

从现代大学制度产生的历史轨迹看,外部权力干预与内在自治要求之间存在固有纷争。作为大学起源的中世纪欧洲大学从它诞生起,就没有停歇过对自由与权力的争取,没有停歇过摆脱世俗政权或宗教神权控制的努力,渴望超然于世俗之外,固守“象牙塔”的独立与自主。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德国新人文主义教育家洪堡于19世纪初创立的柏林大学则揭开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序幕。从此,“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等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原则,使现代大学制度开始具有清晰的内涵表达,从而逐渐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与灵魂。

从大学的学术性本质来看,学术性特点本质地规定着大学必须是一个充分自治的机构。大学一方面在维护自身的逻辑中呈现出远离社会的保守性,另一方面又在适应社会中呈现出发展性。如阿什比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中所说,避免遭受社会抛弃的现实性要求大学必须改变自身以适应新的形势。同时,完成所承担的社会职责的使命感则要求大学在适应社会的改变中要避免破坏大学的完整性。<sup>[8]</sup>这种在追求高深学问和服务社会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的“两难”状况在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大学有固守“象牙塔”所推崇的继承学术传统、坚守大学理念的自由需要,政府有要求其走出“象牙塔”担负社会责任、为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政治需求。这就要求大学与政府要有各自的权力边

界,遵循共同认可的价值规范和权力契约,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大学对社会的重要性来看,政府对大学干预的不断加强难以避免。现代大学走进社会中心的现实使现代大学制度深深打上了知识经济时代的烙印。大学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事务的介入程度越来越深,以至于有必要用“政治的观点”来看待高等教育。布鲁贝克将其比喻为“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sup>[9]</sup>。然而“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的高等教育却有被政府绑架的风险。近代以来法国政府关闭所有传统大学,建立符合其意愿的新型高等教育体系,英国政府通过议案强迫科学技术进入牛津大学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强势的政府行政干预面前,大学自治显得有些乏力。大学自治的自由取向与行政干预的秩序规范成为现代大学制度之外部制度建设的固有且短期难以消除的难题。

同样,现代大学制度要面对的外部关系还包括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来自社会对大学的直接利益要求与大学学术性特点有着很大的矛盾性。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协调?什么样的途径才能保持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都需要相应的制度予以确定和保障。

(二)内在制度的自由与秩序: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博弈

传统大学从“一个居住僧侣的村庄”到成为“一座工业城”再到“充满无限变化的城市”,大学规模逐渐庞大,各种社群间组织结构日益复杂,学校发挥出多种不同的社会功能,大学自身的管理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且越来越复杂。

从我国大学内部权力的构成来看,行政权力主导学术权力是我国大学内部权力运行的通行模式。由于我国大学的产生并没有经历学术自由精神和大学自治理念的长期熏陶,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受阻,从而使得“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大学发展的普遍精神得不到充分体现。表现在内部权力运行上就是大学的行政权力泛化和学术权力弱化,大学普遍具有行政权力至上的特点,管理过程中忽视学术权力甚至以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这一点与欧美高校相比有较大的不同。在

欧美高校,学术权力神圣不可侵犯。“教授就是大学”被西方社会普遍奉行并由此形成了尊重大学、尊重学者的优良传统。

从我国大学内部权力博弈的趋势看,亟需建立责、权、利一致的内部分权体系。在现代大学规模不断扩大和职能不断增加的过程中,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阶层”逐渐形成,大学也建构起一个完整的行政体系。大学“学术—行政共同体”的逐渐形成,使现代大学成为一种“多元的”机构。强调管理为先,秩序至上的行政科层体系着眼于重视效率和低成本运作,强调以行政权力控制组织内部上下的沟通。然而,大学的“松散联合体”性质决定了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的共同作用才能保证大学在整体稳定有序的状态下不断得到发展,而其关键点则是建立边界清楚的大学内部分权体系。如果不能处理好现代大学制度内部这种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失衡,大学组织将会发生异化。<sup>[10]</sup>

因此,从大学制度的内部建设看,不断扩大的各种管理,本身就对学术自由产生重大影响,行政管理与学术自由能否得到共同发展也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问题。

## 五、“有秩序的自由”:现代大学制度价值的追求

著名政治学家卡尔·施密特在谈到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型时曾说:“传统政治的主体是国家,现代政治的主体是人民。”卡尔·施密特的论断深刻揭示了现代政治两个最重要的范式转换。一是政治秩序建构主体的转换。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型,使得以国家为政治载体的秩序的建构向“人民”获得政治的合法性转移,政治国家由秩序的主宰变成“人民”建构秩序的工具。二是政治发展核心价值的转换。传统的通过政治来建立秩序的价值追求转变为对政治自由的追求,政治的核心价值不再是通过建立秩序规范对自由进行约束而在于人类通过政治来获得自由。<sup>[11]</sup>换言之,政治秩序成为实现自由价值的途径。卡尔·施密特的论断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我们之所以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因为现在的大学制度无法解决大学自身运行和发展中内部关系处理的诸多痼疾,无法理顺大学运行中与政府、社会等外部关系主体的诸多矛盾。我们要建立的现代大学制度是要使大学回归

大学固有传统,坚守内在精神,从以国家为政治载体的秩序的建构向以大学自身为载体的自由的建构转变。显然,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也面临两个重要的范式转变。

一是现代大学制度建构主体的转变。我国当前的大学除财政经费主要依赖于政府以外,在学科建设、专业设置、招生就业、人事任命等各个方面都高度受制于政府。大学是名义上的独立法人,但是缺乏基本的办学自主权。现代大学制度是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要求大学自身应该成为大学制度建设的主体。大学对社会发展的意义越重大,越应尊重大学办学的自主性,使其按照办学规律办学为社会进步做出更大贡献,而不是在逻辑上颠倒为政府对大学的控制不断加强,从而扼杀了大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持续后劲。

二是现代大学制度价值追求的转变。长期以来,在政府行政主导的办学模式下,大学办学的功利化倾向和工具化取向明显。由于过于强调大学对社会发展、国家建设的责任和贡献,政府习惯于对大学的微观管理,注重形式上的整齐划一,偏好大学办学的政治需要。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看,我们要尽力改变政府对大学办学外部规范和秩序的过度强调使现代大学办学能够将对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等的追求放在对大学管理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追求之上。唯有如此,我国现代大学才可能迎来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

#### 参考文献:

- [1]麻美英.规范、秩序与自由[J].浙江大学学报,2000,(6):118.
  - [2][美]郝钦斯.民主社会中教育上的冲突[M].陆有铨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8.
  - [3]别敦荣.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探析[J].江苏高教,2004,(3):1-3.
  - [4]甘阳.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J].读书,2003,(9):3-13.
  - [5]张建奇,杜驰.民国前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J].大学教育科学,2005,(6):64.
  - [6]王洪才.试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价值导向[J].复旦教育论坛,2005,(3):22-26.
  - [7]张俊宗.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代回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68.
  - [8][英]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13.
  - [9][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2.
  - [10]朱平.现代大学制度的制度理性[J].现代教育管理,2013,(4):14.
  - [11]刘海涛.从秩序到自由:政治文明之传统性到现代性的价值转换[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41.
- (责任编辑:杨 玉;责任校对:陈少武)

## Freedom and Order: The Value Game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HE Yi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Freedom and order is the value main line through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construction. As the pursuit of freedom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must uphold academic requirements,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keep the university atmosphere of freedom and independent spirit, but the reality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increasingly into the social center is requiring modern universities adapt to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and it is seen as a tool to achieve social purposes. The value conflicts of freedom and order manifest the power struggle of external intervention and university autonomy outside the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s internal performance is the academic power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in the value game.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value should be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freedom and order, and ultimately to achieve an orderly freedom.

**Key words:** freedom; order;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value game